

黄淳浩 著

创造社通观

崇文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创造社通观

黄淳浩 著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社通观/黄淳浩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4.9
ISBN 7-5403-0789-7

I. 创... II. 黄... III. 创造社—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1113号

责任编辑: 蔡夏初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 430070)

印 刷: 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黄淳浩专著《创造社通观》给人总的印象是：积累丰厚，精研有年，学风严谨，成果颇有价值。

黄淳浩曾经以多年时间参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编辑、注释和统稿工作，因而通读了郭沫若的全部文学著译，遍览创造社期刊，熟知创造社历史及该社成员的活动和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出版了专著《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郭沫若书信集》，还出版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又为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学通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撰写了有关章节和条目，更发表过相关论文多篇。

厚积薄发，本书有分量。它从宏观上把握创造社这个重要文学社团的历史，并从文学思潮着眼，梳理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再从微观入手，细致地逐个编写创造社成员的传记、论述其创作、抉发相互关系。有史有论，有分有合，纵横交错，点面相融。这不但是综合地全面地研究创造社的第一本书，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有相当多的论述都具有独创性。比如，说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前期没有划一的主义、中期写实与象征并举、后期独尊普罗文学，这就比将创造社和浪漫主义划等号的一般说法，要细腻、深入、准确得多，就是新见解。

清理文学史，总结经验教训，需要这样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认真研究，缜密思考，提炼精髓的著作。本书还是力戒华而不实的浮夸文风的科研成果，它处处有据，字字是实，论从史出。它逻辑严密，文字清晰，叙述历史而不枯燥，阐述见解而不虚空，是老实人的老实著作。

· 专家推荐意见 ·

黄淳浩多年来从事创造社的研究,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著书立说,成绩显著。他已经出版了《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发表过有关创造社及创造社作家研究的多篇论文。新著的这本《创造社通观》,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无论在内容和质量上都有进一步的拓展。阐明了创造社这个重要的革命文化团体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详细介绍了创造社的三个时期、主要活动,以及在文艺思想上怎样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通过“作家传记谱”和“人物关系图”,对创造社作家群进行了综合与重点相结合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精英,只有个别宵小”,是符合历史的,公允的。着重探讨了郭沫若、郁达夫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并对其他过去很少论及的创造社作家及其作品作了分析和介绍,弥补了以往研究工作的不足。这是本书的一个贡献。

本书材料翔实,立论精当,文笔也相当生动,是一部很有学术水平的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桑逢康

目 录

历史风云卷：

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苍头突起

- 一 文学革命对于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 2
- 二 适应着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 5
- 三 创造社的成立和三个阶段的划分…………… 7
- 四 初期创造社的主要活动 …………… 14
- 五 中期创造社的主要活动 …………… 18
- 六 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活动 …………… 28

文艺思想论：

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

- 一 初期创造社倡导没有“划一的主义” …………… 39
- 二 中期创造社坚持写实与象征并举 …………… 52
- 三 后期创造社独尊普罗文学 …………… 59

作家传记谱：

绝大多数是精英，只有个别宵小

- 一 初期创造社之巨匠崛起 …………… 68

二 中期创造社之群星荟萃	81
三 后期创造社之晨星闪烁	95

人物关系图：

未见“创造”气，不乏“创造”情

一 对远方“蚂蚁”的思念 ——郭沫若与成仿吾	106
二 “二十余年如一日” ——郭沫若与郁达夫	128
三 相识相期却终至分道扬镳 ——郭沫若与张资平	155
四 两位诗人政治家的终生交往和共同战斗 ——郭沫若与冯乃超	179
五 “永远的旅人”行动上却未离创造社朋友 ——穆木天与创造社	195

创作品评谈：

时代精神和创作个性的张扬

一 与时俱进的郭沫若的文学创作	202
二 郁达夫的创作及其风格流派的形成	223
三 极富创作个性的其他创造社作家的创作	241

后记	257
----------	-----

历史风云卷： 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苍头突起

创造社是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中崛起的。它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掀起的那个文学新浪潮，既与封建旧文坛的那种旧文艺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将其视为死敌；也不同于新文坛内先他们而起的以《新青年》、《新潮》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那个类型的新文艺。在新文化运动之中，他们是独树一帜，异军苍头突起。用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的话来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要算第二期的人物了，《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前一期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正可以体现他们的运动的精神。实际上，他们正是秉承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意旨来的。因为文学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文学从长期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推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创造出崭新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文学作品来。

一 文学革命对于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

早在我国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相继发表文章，呼唤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到来。1915年，当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感叹当时“充斥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实情也正是这样，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我们的民族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都长期地封锁在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因循死寂的氛围之中，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点活力。而“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因此他“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因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并希望他们“有以自觉而奋斗耳！”^① 1917年2月，在《文学革命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说：“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因此，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呼吁广大文学革命军一方面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一方面还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领导人李大钊，则更加意识到了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危机，因而在1916年8月就发出了“创造”“青春中华”的号召。他说：“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稊之黄昏已去，新稊之黎明将来”。“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他属意于“青春中华之创造”，更属意于青春文化性格的出现：“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继而，在1916年的9月，李大钊又发表了《青春》一文，畅言“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他号召广大青年振“江河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奋自我之欲能”，以使我国国家民族得以“回春再造”。他说：“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断断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还说：“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囿，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他要求青年“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③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醒，并最终使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得以振兴，文化得以发展。新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一方面既要几千年的封建旧文化进行彻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② 守常：《〈晨钟〉之使命》，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③ 李大钊：《青春》，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底的批判和扬弃，以冲决既往历史的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囿，涤荡传统文化之积秽，他方面还要寻找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并承继我传统文化中之精华，塑造新的民族个性和民族文化，建设既足以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而又不失我中华特色的个性文化。因此，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他们都一致地呼唤文学和文化的青春浪漫气息，以使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得以“回春再造”。

遗憾的是，回顾“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打先锋的《新青年》也好，《少年中国》也好，在新发表的作品之中，真正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堪称“特立独行”，能“奋自我之欲能”，“振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敢于“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创造了新的青春人格和青春文化的作品，却并不多。“五四”新文学的开篇，是鲁迅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和一发而不可收、辑之于《呐喊》中的那些“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猛烈抨击封建旧制度和深刻剖析国民劣根性的小说；继之而起的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虽然能激起人们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沉重的思考，也不乏对“被侮辱与被践踏者”的同情，不乏对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客观描写，以及救国救民的痛心呐喊。但正如一些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在文坛上大量涌现的那些创作，虽然也“蕴涵着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某些认同感，作为叙述者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下层人物的同情”，但却“改变了新文学确立的青春主题”，因为在那些“文学创作对下层人物不幸生活的客观描写中，只有青年知识者的同情心，而少有青年形象的出现，青春文化观念被淹没在一般表面的社会现象的描述中”^①了。在创造社“异军突起”于新文坛之

① 周海波：《前期创造社与五四青春人格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关于青春人格和青春文化的创造，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召唤上。

二 适应着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个文学社团的崛起，大致都由于时代社会的需要，文学运动发展的需要，和作家自身内在的需要。创造社的诞生，当然也是这样。

从时代社会的需要来看，我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国家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后，中国人民在深重的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复又蒙受了一重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群众之中蕴藏着一股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他们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吸引。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群众中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和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朦胧追求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且形成了实际的革命行动。“五四”不仅成了我国人民追求思想解放、人性觉醒的运动，而且成了力图振兴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狂飙突进的运动。理所当然地，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心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强烈的表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正是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最早表达。

遗憾的是，在第一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之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文学中却表现得不够。作为新文化运动先声的文学革命运动，虽然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发生了，成效和实绩虽然也不小，但并不理想，而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文学革命运动更走入了低谷，文坛上出现了新文学阵营势单力薄，新文学作品青黄不接，大有旧文学卷土重来的趋势。正如成仿吾1920年在给郭沫若的

信中所说：

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

这是几句足以流芳千古的经典性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表明，新文坛在企盼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以加强自己的阵线，促进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郭沫若他们也正是由文学发展的这一需要出发，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并决心筹组创造社，崛起于苍凉寂寥的新文坛的。

1931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之中，沈从文还曾从文学的不同艺术方法和风格特点，比较过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作品的不同效果和作用，从中可以窥见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也许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乃至群众，特别是青年的心声更相契合一些。他说：“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与上列诸作者（按：指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② 沈从文的这些话说明，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创造社的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旗帜的文学，也许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和群众心声。

创造社所以能适应这一形势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与其成员多

① 转见 1921 年 1 月 18 日郭沫若致田汉的信，载 1930 年《南国月刊》。

② 1931 年 4 月 30 日《文艺月刊》第 2 卷第 4 号。

在日本留学的环境有关系。虽然他们都是在清末民初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赴日留学的，所以不是学医，就是学工，或学经济、学法律，但这些人自幼爱好文学，在留日学习期间，又从不同的渠道，广泛地汲取了异域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起了创作的欲望。他们分别从文学的不同思潮流派如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乃至唯美主义等等文学之中去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成员之间彼此并不尽相同的文艺思想；虽然如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说，他们在“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和“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①这两点上，是相同的。这与他们在国内感同身受地受过封建礼教和传统的压迫，在日本又感同身受地领略过“东洋气”的滋味有关。因此他们以都在异国求学的同学或同乡的情谊，形成了一个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小集体，相约要共同创办一个纯文艺的杂志，以便为新文学闯开一条生路。

三 创造社的成立和三个阶段的划分

创造社的成立，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孕育期。

据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创造社的受胎来自1918年8月他与张资平在福冈博多湾箱崎海岸的那次邂逅和谈话。张资平是广东梅县人，曾与郭沫若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了一年学，这次是刚刚回国参加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罢课风潮后返回日本。因此一见面自然地就谈起国内文化界的情况来。郭沫若平素对《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等国内有数的几

^① 原载1930年4月10日《文艺讲座》第1册。

份大杂志就有意见，说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张资平也说国内“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虽然“还差强人意”，但“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郭沫若当然对此看法有同感，就说：“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①

于是，他们开始酝酿同学中哪些可以做文学上的同道。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和成仿吾。郁达夫是他们共同同学，不仅常写旧诗在《神州日报》上发表，而且也在写小说，是一位很有文学天才的人物。成仿吾是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学生，他虽然是学军械制造的，但中外文学涉猎颇广，而且英文功底厚，思辨能力强，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19年，郭沫若因投稿的关系结识了《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宗白华（1897—1986），又以宗白华的介绍而认识了田汉。田汉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英文，他不仅喜写诗，爱看戏，而且擅交游，对中外戏剧颇有研究。宗白华和田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对郭沫若的诗才都很倾慕，曾称郭沫若为“东方未来的诗人”。1920年，田汉曾从东京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赶到福冈拜访郭沫若。他俩共同游览，即兴谈吐，一会称道自己是孔丘和李耳，一会又自比为歌德和席勒，他们还共同把年初以来与宗白华论诗、说戏、谈论婚姻恋爱、人生哲学和志趣抱负的相互通信汇编成了一部《三叶集》。当年五月，这部三人通信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立即在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青年中间风快流传，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浪漫主义的旋风，从思想上、文化上公开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宣战。《三叶集》所向国人展示的那种新的艺术观、恋爱观和人生观，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振动。该书当年多次再版，不仅成了国内最畅销的书籍，而且为创造社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因为田汉的关系，他们开始与当时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的郑伯奇，穆木天，又因郑伯奇等的关系，而与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的徐祖正、张凤举，与在东京念书的何畏、方光焘认识，交往和联络上了。郑伯奇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是专攻哲学和心理学的，但兴趣却在文学和新闻。穆木天是一位诗人，又喜欢童话，在大学是专攻法国文学的。徐祖正和张凤举两人都在大学文科学习，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搞文学的人。何畏是专攻美学和社会学的，喜欢理论，创作不多，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方光焘是田汉的同学，也是学英文的，后来专攻语言学。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福冈还把他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同窗好友陶晶孙，一个多才多艺，会弹琴、作曲、画画、演戏、写小说的人邀请来参加。

就这样，他们征集同仁的工作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东京、京都、福冈，他们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三点一线地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不仅进行了人事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在创作和出版方面也作过一些准备。

1920年春，他们曾试办过一个取名叫《Green》的刊物，译音为“格林”，英文有绿色的、青春的、新鲜活泼的和朝气蓬勃等意思。看得出来，刊物的名字不仅体现了同仁们的一种希望和追求，而且也是他们对时代社会呼唤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积极的反响。刊物共出过两期，第一期出在1920年的上半年，刊载的有郭沫若后来收在《女神》中的一些诗，成仿吾的《新年与流浪人》，第二期出在1921年春，发表的有陶晶孙的《木犀》等。

不过他们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各成员都多方作了努力，事情均不见成功，后来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使他们出版同仁文艺刊物的夙愿最终得以实现。那就是1921年1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准备改组编辑部，有人推荐成仿吾，于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道回沪，拟相机筹办他们朝思暮想的文艺刊物。由于1919年以来，郭沫若《女神》中的一些诗和其他文章，即在《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民锋》等杂志上发表，《三叶集》的出版更使他在新文坛上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因此，赵南公马上决定留下郭沫若在泰东工作。

在泰东，郭沫若日夜忙碌，为泰东图书局编了《女神》、《茵梦湖》、《西厢》和《革命哲学》等好几本书，作为献给泰东的见面礼。

几部书的编出，使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于是，郭沫若适时地提出另出一种新的文艺杂志以专容他和他的志同道合朋友的文字的建议，赵南公一则出于对新文化事业的支持，一则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出版家，也看到郭沫若他们确有一定的实力和利用的价值，于是慨然应允了他们的要求。至此，郭沫若他们酝酿和筹划数年的要出一种纯文艺刊物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

就这样，郭沫若带着多年夙愿即将实现的兴奋和对赵南公胆识的钦佩、感激，乘船离开上海返回日本，想尽快把事情落实下来。在京都，他会见了郑伯奇、张凤举和穆木天。在东京，他会见了郁达夫、田汉、张资平、何畏、徐祖正他们。6月5日，在东京他首先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胃病的郁达夫，在这里他们作了倾心的长谈，相互交换了对国内文坛的看法，以及他们即将出版的杂志的刊名、稿件的供应和出版的周期等等，实质性的问题终于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关于这次探访，郁达夫十分感动，出院即写了一篇题为《友情和胃病》的自传体小说，详细地记载了这